

涵芬香远译丛

Churchill:
A Study in Greatness

丘吉尔

追寻伟人的足迹

〔英〕杰弗里·贝斯特 著
贾文娟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涵芬香远译丛

丘吉尔

——追寻伟人的足迹

〔英〕杰弗里·贝斯特 著

贾文娟 译

 商务印书馆
1897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2 · 北京

Geoffrey Best

CHURCHILL
A Study in Greatness

Original work copyright © Geoffrey Best 2001.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丘吉尔——追寻伟人的足迹/ (英)贝斯特著; 贾文娟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涵芬香远译丛)

ISBN 978 - 7 - 100 - 08693 - 6

I. ①丘… II. ①贝…②贾… III. ①丘吉尔, W. L. S. (1874 ~ 1965) 一生平事迹 IV. ①F835.61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15613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丘吉尔

——追寻伟人的足迹

(英)杰弗里·贝斯特 著
贾文娟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8693 - 6

2012年10月第1版

开本 787 × 1092 1/16

2012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4 1/4

定价: 49.80 元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不愿上学	5
第二章 欣然参战	15
第三章 新郎和议员	27
第四章 贸易部和内政部	41
第五章 海军大臣	53
第六章 达达尼尔海战	71
第七章 东山再起	89
第八章 布尔什维克和爱尔兰人	109
第九章 东方问题	121
第十章 保守党大臣	131
第十一章 帝国和印度	151
第十二章 查特韦尔和希特勒	165
第十三章 “温斯顿归来！”	185
第十四章 巅峰时刻	197
第十五章 民主军阀	213
第十六章 “今天行动”	227
第十七章 美国和罗斯福	247
第十八章 特种作战和空袭行动	267
第十九章 法国和戴高乐	281
第二十章 苏联和斯大林	291
第二十一章 前景暗淡	307
第二十二章 铁幕	319
第二十三章 首脑峰会和核武器	335

第二十四章	重回唐宁街	349
第二十五章	桑榆晚景	365
第二十六章	后记	381

前 言

1940年春，温斯顿·丘吉尔的名字突然进入我的脑海，可以说当时他成了我记忆中最最重要的人。在少年时代我的祖国卷入的战争中，丘吉尔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假战”的结束，丘吉尔的形象变得越加真实，甚至可以说超级真实，因为当时没有哪个英国人可以像他一样通过实实在在的形象、声音、理智和情感打动国人。他的广播讲话成了英国人翘首以待的无异于宗教仪式的重要活动。1942年，因成绩优异校方告诉我，可以送我一本书作为奖励，我清晰地记得当时毫不犹豫地提出希望得到丘吉尔五卷本的《战争演讲》（*War Speeches*）。更让我兴奋不已的是，现在我家中珍藏的丘吉尔讲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著作《世界危机》（*The World Crisis*）的背面非常显眼地印有当时的出版日期：1943年。在我的心目中，丘吉尔集英国政治家老威廉·皮特（Pitt the Younger）、海军上将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前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于一身，他是漫画家笔下约翰·牛（John Bull）形象的最佳体现，但无疑这一形象蕴涵着更多个性、智慧、文化和亲近。

随着战争逐渐进入尾声，在我的心中以及在许许多多其他人的回忆中，丘吉尔叱咤一时的风光渐渐淡去，他的首相宝座由在长相和音色上和他迥然不同的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取代。战争即将拉上帷幕，我们

很快将进入一个没有丘吉尔的新时代。尽管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也不乏耻辱和失败，青年时期，我也曾对他的政治劲敌抱有极大同情，但即使如此，我的信念——丘吉尔是难得的伟人——从未改变。后来我饶有兴趣也颇为开心地注意到丘吉尔仍频繁出现在英国和整个国际政治舞台上。在他辞世的这一天，经女王建议，内阁决定为他举行国葬，我守着电视机，静坐在那里，整个仪式过程中我的双眼一刻未曾离开。此前及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我从未如此专注地观看过任何其他电视直播。

在我的研究中，第一个阶段包括对他早年经历的挖掘，这其中不免某种情感上的迷恋和深深敬意。坦诚地讲，第二个阶段（即本书的高潮部分）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作为史学家，当时我的研究兴趣已从18、19世纪英国社会史转向了国际史和近现代战争史，我也因此开始了解欧洲帝国发展史的崛起和生命力源泉。在我看来，在非洲和印度战争期间，丘吉尔还没有资格跻身战争英雄的行列。研究方向的转变让我有幸深入了解了1914—1918年及1939—1945年的两次世界大战，虽然我的材料主要来源于丘吉尔自己的著作，但研究过程中，本人不断意识到其他史学家及参与了两次战争的人对大战的讲述和丘吉尔自己的描述不尽相同。这和我的想象相差甚远，但它也给我的研究带来了不少乐趣。这一阶段，我同时看到在没有完全投身于战争前，丘吉尔过着怎样充实而独特的生活。那些年里，源源不断的有关丘吉尔研究的书籍、文章的出版也使他变成了一个越来越复杂的人物，从某些方面看，丘吉尔性格中相互矛盾的地方越显突出。本书涉及了丘吉尔性格和言行中矛盾、复杂的一面，但并未就其原因做出详尽、透彻的分析。从某种程度讲，他的童年生活是悲惨的，不可思议的是，从丘吉尔成年后的性格中表现出的各种过人之处来看，童年的经历并未对他产生深刻影响，甚至可以说童年时期的丘吉尔和成年后的丘吉尔完全判若两人。丘吉尔的私人生活和政治生活紧密交织。不得不提的是，从33岁起，他拥有了一位智慧、贤淑，给予他事业坚定支持的妻子，从此家庭成了他温暖的避风港。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和他的许多同事、朋友及政治劲敌相比，他对婚外恋毫无兴趣，对

此，我认为无须做过多心理分析。我的研究重点在丘吉尔的政治生涯上，从22岁起，他便进入公众视野，他喜欢政治，喜欢受人关注，一生中，他积极努力，让自己尽可能长时间地活跃在这一舞台上。26岁成功竞选议员，33岁荣升大臣，在热衷传统、官僚老化的英国这可谓凤毛麟角。他进出于两党之间，在九个部门的大臣位子上移来换去。有目共睹的是1940—1945年，丘吉尔带领英国人民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但近几年，正是这一角色给他带来了众多批评和质疑，这也正是我迫切希望得到答案的地方，在完成此书后，我仍支持早年人们对丘吉尔一生达成的共识：正如A. J. P. 泰勒（A. J. P. Taylor）在他的丘吉尔传记《1914—1945年的英国历史》（*English History, 1914—1945*）中讲到的：“丘吉尔拯救了他的国家。”

像丘吉尔这样的伟人自然会成为众多作家青睐的对象。丘吉尔的儿子伦道夫曾为父亲撰写传记，后来这部作品由马丁·吉尔伯特（Martin Gilbert）先生最终完成。许许多多的作家和评论人员都曾为丘吉尔做过传记，其中包括一些我们这个时代最优秀的史学家。丘吉尔一生中的重要成长阶段，经历的重大事件目前均已得到深入研究，几乎每一个和他共事或密切接触过的人都曾发表过回忆性的文章或专著。让我感到非常欣慰的是，在我的著作出版前，已有许多作家在丘吉尔研究方面做过精辟、深刻的分析和论断，而我则有幸站在他们的肩膀上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从过去到现在，丘吉尔一生中的众多方面都存在很大争议，在这些地方，我很高兴自己能够不受他人思想的左右，通过史实得出自己的判断。讲出那些存在争议的地方事实上可以说是勾勒了丘吉尔整个政治生涯的大轮廓：两次就任第一海务大臣时大刀阔斧的改革；对达达尼尔远征的极力推崇；对俄国革命不遗余力的干涉；在爱尔兰独立斗争和印度自治运动中的坚定立场；20世纪30年代后期对英国政府绥靖政策的强力抗议，首次建立英美“特殊关系”；对核武器阴影下国际关系的真知灼见。我相信人们对与以上内容相关的丘吉尔的言论和行为的研究还将继续下去。在人类近现代史上，像丘吉尔一样深刻影响历史发展轨迹的人物屈指可数。

考虑到丘吉尔本人就是一位英语语言大家，书中我尽可能多地引用了丘吉尔自己的表达和评论，但同时为了吸引普通读者，书中还加入了不少丘吉尔的妻子克莱门蒂娜和他的女儿玛丽的回忆片段和信件节选。

这里，首先我要为所有为本研究提供素材和基础的史学家和作家表示诚挚的感谢。接下来，我要为收藏这些书籍的图书馆表示衷心感谢，它们包括牛津大学博德莱安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牛津大学科德林顿和圣·安东尼学院图书馆（Codrington and ST Antony's College）、剑桥的丘吉尔档案中心及伦敦的皇家艺术学院。在收集的所有照片中，尤其要感谢伦敦的帝国战争博物馆、国家肖像馆、牛津大学的伯德雷安图书馆、丘吉尔档案中心及华盛顿的国家肖像馆。另外还要感谢很多为本书提供材料的作家同事和朋友。最后非常感谢托尼·莫里斯（Tonyrt Morris）、马丁·施地帕德（Manin Sheppard）、我的出版商及我的妻子在本书写作中给予的指导、鼓励和大力支持。

衷心希望本书可以为读者提供一个全面、客观地了解伟人丘吉尔的全新视角。完成这本著作既满足了我自己对这位杰出领导人的好奇和爱戴，同时我相信它也能满足年青一代对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英国人的认识渴望。

第一章 不愿上学

“在大人们看来，我是个‘爱惹麻烦的孩子’。”

——《我的早年生活》(*My Early Life*)，第16章

温斯顿·伦纳德·斯宾塞·丘吉尔(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出生的国家和社会处在一个卓越的时期，他的父母亲也都是了不起的人物。

丘吉尔生于1874年11月30日，确切地讲，当时的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当属世界上的“上流国家”，工商业的繁荣发展使这里被世人誉为“世界工厂”，它的商业运输舰队挤垮了所有竞争对手，这里制造的船只远销世界众多国家。在那个时代，伦敦不仅是欧洲最大的城市，也是世界金融中心。英国的对外投资和由此收获的影响远超它最具威胁的对手——法国和荷兰；臣服于英国主权的海外疆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在这一点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和英国匹敌。

丘吉尔出生不久，两件大事使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目光再次聚焦英国：1875年，英法两国争夺苏伊士运河的斗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最终首相迪斯雷利(Disraeli)斩获苏伊士运河绝对控股权，法国只能乖乖退让；1877年，大英帝国的殖民版图中又新增了印度，维多利亚女王郑重地宣布同时成为印

度女皇。英国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而久负盛名的海军，国民自豪地认为它会控制世界上所有的水路运输，只有为数极少且颇具洞察力的人和一些消息灵通人士清醒地认识到英国的海上霸权不可能永续辉煌。尽管很难察觉，但事实上当顶的太阳已经开始慢慢西斜。对于各个阶层的年轻人来讲，倘若他们有能力、有决心离开祖国外出游历，就会发现大英帝国的政治经济影响无处不在，这也为他们每一个人提供了津津乐道的谈资，对年轻的温斯顿·丘吉尔来说也不例外。但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大英帝国及其大都市伦敦对整个世界的影​​响令丘吉尔感到异常自豪，很多时候甚至颇有唯我独尊的想法，这一态度影响了他的整个人生。“二战”中，英国人及其盟国毫无理由地对丘吉尔的这种爱国激情深感遗憾，这种思想的确也时常给他带来麻烦，人们对他的评价也因此褒贬不一。

丘吉尔的祖先都是大英帝国的统治精英，他的父亲是第七代马尔波罗公爵（Duke of Marlborough）的三儿子。小丘吉尔出生于宏伟壮观的布伦海姆宫（Blenheim Palace），11月30日星期一凌晨1时30分，一个早产婴儿像未听到发令枪响就偷跑的运动员一样，急匆匆地来到了人世，他要么早产两个月，要么母亲结婚时已有身孕。尽管贵族血统和显赫的社会地位不能绝对保证成功的人生，但这的确奠定了良好的开端。英国的政治精英往往也是他们的社会精英，这些人会在特定的场合和地点相遇，社交场合有如神圣的节日在他们的日程中必不可少，他们喜欢的活动包括去古德伍德（Goodwood）和艾斯科特（Ascot）参加赛马会、在上院举行板球比赛、到恒利（Henley）观看帆船赛、参加隆重的射猎会和多彩的俱乐部活动，另外还包括出席一轮又一轮的乡村聚会，但最重要的却属每年一次的伦敦社交季。据观察，英国社会中位于最顶端的是伦敦社交界，它极度排外。年轻的丘吉尔当时还不能理解布瑞克耐尔夫人（Lady Bracknell）对外甥的训诫：“阿尔杰农（Algernon），永远不要讲不尊重伦敦社交界的话，只有那些无法进入这个圈子的人才会那样去做！”^①

^① Oscar Wilde,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 (1895), Act III.

丘吉尔在他1930年出版的自传《我的早年生活》中回忆了这一独特现象。

在那些日子里，英国社交界仍保持了它旧有的形式。那是一个辉煌、强大的组织……从很大程度上讲，在这里大家互相认识，并清楚自己的身份和位置，那些多年来统治英国并见证英国辉煌崛起的上百个家族又因联姻形成一张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不管到哪，你都会遇到亲朋好友，社交界的头号人物在很多情况下也是议会的重要政治家和绿草地上有名的运动爱好者。当纽马基特（Newmarket）有赛马会时，日理万机的贵族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常会将内阁会议丢在一边前去一睹为快；在下院，为去德北（Derby）给赛马会呐喊助威而推迟会议已成惯例。在兰斯当（Lansdowne）、戴瓦什尔（Devonshire）及斯坦福德（Stafford）王族那里举办的高贵奢华的聚会上，我们可以看到尊贵的议会议员、陆军和海军高级军官、显赫的政客等等，他们谈论着政治、军事、国家政策，这些聚会充满了欢声笑语也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社交圈，非常高兴我可以在仅有的几个月里见证这样一个已经消失的世界。^①

以上文字中，丘吉尔以一个史学家的眼光和一种挽歌式的告别语气表达了对时光流逝、社会变迁及已成历史的骑士时代的浪漫遗憾；一定程度上，它也让我们看到成年丘吉尔越来越少地展现出这种贵族身份，尽管社会学家不假思索地将他归为贵族。在政治上，他与煽动变革的自由党人戴维·劳埃德·乔治（David Lloyd George）交往密切，1914年前，他们“英雄所见略同”的激进态度使很多贵族将他视为本阶级的叛徒，当然，和贵族朋友们在一起时，他也总能巧妙地融入其中（一些保守党人不愿与他来往）。在一生中，他喜欢与品格高尚的人为友，闲暇时也总会参与一些上流社会的社交活动。但他讨厌年复一年地浪费光阴，他的朋友和休闲活动与贵族阶层慢慢拉开了

^① *My Early Life*, ch. 7.

距离，渐渐他有了属于自己的圈子，这里有学术圈的人，有报界人士，有轻浮的人、怪人以及有钱人。早年丘吉尔喜欢射猎，但最让他着迷的运动是富有异域情调的马球，年富力强的时候，一有空他便冲向马球场，高尔夫球一直都不是他擅长的运动。当其他人高速驾驶汽车的时候，他选择了驾驶飞机，直到几次险些丧命，妻子和朋友才劝服他放弃了这种危险游戏。在位于肯特郡（Kent）查特韦尔（Chartwell）的家中，自1924年开始，丘吉尔极力回避传统的乡村休闲方式，在户外，他更喜欢建筑和作画，不出门时，则宁愿待在家里读书、聊天和写作——这些事情基本等同于说话，因为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通过口述完成的。日程表反映了他特有的癖好：在床上工作到中午，然后从晚饭后开始又继续工作到凌晨两三点，手头的工作被他称为“命运的大浪”。一旦停下来，他便饶有兴趣地问这些工作将把自己带向何方，以及它们对大英帝国将有些哪些帮助。丘吉尔完全可以留在上院，但他选择了放弃，做一名伟大的下院领袖才是他真正的梦想。

丘吉尔的父亲是伦道夫·丘吉尔勋爵（Lord Randolph Churchill），读者可以依自己的政治观点说他颇有声望或声名狼藉。伦道夫·丘吉尔生于1849年，从1874年开始就在伍德斯托克（Woodstock）拥有家族席位，直到1885年第三改革法案废除了这一席位[此后他在南帕丁顿（Paddington South）任职]。伦道夫是下院最引人注目的年轻保守党人，他眼睛突出，胡子浓密，看上去轻松活泼，这一形象也自然成了当时一位政治漫画家的最爱。19世纪80年代前，轻狂的伦道夫追逐名誉和权力，是议会“生姜集团”的代表人物（其成员自称为“第四党”），他喜欢把事情搞得热闹而激烈起来，不仅对首相格莱斯顿（Gladstone）是这样，对自由党及下院自己党派严肃、呆板的领袖斯坦福德·诺斯科特爵士（Stafford Northcote）也同样如此。诺斯科特对首相唯命是从，这使他几乎忘记了自己的本职工作是领导反对党。才华横溢的议员、能言善辩的演说家以及越来越倾向于成为一名蛊惑人心的政客使伦道夫在那些年里变成了名声大噪、最吸引人眼球、看上去也最具民主倾向的一位保守党政客（但他到底有多民主现在仍存有争议）。1886年7月，伦道夫被任命为索尔兹

伯里的财政大臣，在当时，财政大臣是仅次于首相的重要职位，许多首相也都是从财政大臣的位子上晋升上去的，所以议会观察人士很自然地认为伦道夫将是未来首相的不二人选。然而由于急于表功，他的好运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因为不安于做一名知足常乐的内阁成员，伦道夫表现得越来越大，甚至粗暴，最后他竟在令人敬畏的首相索尔兹伯里面前大胆炫耀自己的政治影响，但却没有得到他人支持，最终颜面尽失地惨败收场。首相接受了他的辞呈，从财政大臣的位子上退下来的伦道夫很快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急剧滑坡，他开始憎恨周围的人，并深感失落、抑郁和孤独。政治生命的结束，再加上病情的日益恶化和精神错乱使伦道夫在1854年绝望地离开了人世（长期以来，因某些人的恶意诋毁，人们认为伦道夫患的是梅毒，但最近有充分资料证明，他很可能患有脑瘤。此外，他当时心情郁闷，神经衰弱）。^①

根据丘吉尔自己的描述来看，他对父亲了解甚少，但他还是从性格古怪的伦道夫身上继承了很多东西。现在，我们只能去猜测父亲对儿子的忽视甚至是不喜欢到底对丘吉尔产生了哪些影响，但丘吉尔自己则认为父亲一直都是关心、牵挂着他。擅长于心理分析及有这种写作嗜好的作家认为丘吉尔成年后的性格主要归因于童年及少年时代父母对他的漠不关心以及当时感觉被人拒绝的压抑。现在看来，丘吉尔忠实于父亲并对他充满了敬意。在多年后出版的内容详尽的传记中，丘吉尔回忆了他的父亲：一个失落的英雄，并把他视为自己学习的楷模。显然在很多方面丘吉尔继承了父亲的特征，或者说他和父亲有着很多共同之处：自大、无畏、急切地希望引起他人注意、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和解决复杂难题的非凡能力、果断机敏、精力充沛、擅长演讲、滔滔不绝、幽默、无礼、急躁鲁莽、玩世不恭，有时也有缺乏理智判断和不讲策略的致命弱点。熟悉伦道夫的人都说，丘吉尔和父亲做事如出一辙，但很难说这种相似是出自基因还是因为这个受到忽视的儿子出于崇拜英雄而模仿了父亲。

^① John Mather, 'Lord Randolph Churchill: Maladies et Mort', in *Finest Hour: The Journal of the Churchill Center and International Churchill Society*, 93 (Winter, 1996 - 97), pp.23 - 28.

来自母亲詹妮（Jennie）的优良遗传基因也不容忽视，她是美国人，父亲伦纳德·杰罗姆（Leonard Jerome）是美国纽约的百万富翁，从事房地产经营和股票投机，同时还创办报纸，建立了纽约音乐学院，詹妮在三个女儿中排行老大。在伦道夫向她求婚并赢得她的芳心时，詹妮还居住在巴黎。杰罗姆三姐妹和其他美国女孩不同，她们颇有些乐不思蜀，在欧洲，三个人满心欢喜地融入了这里的文化氛围，并且全都嫁给了英国贵族，两个妹妹的境况比詹妮稍差一些。詹妮的父亲决定每年给女儿2,000英镑的财产，但后来他惊奇地发现伦道夫这位英国贵族新郎竟想将大部分财产占为己有，而不是像他当初希望的那样由女儿全数支配。詹妮的父亲与女儿女婿的家庭律师展开了持久的讨价还价，最终同意每年给女儿1,000英镑，按现在的标准这一数目并不是很可观。俏丽、聪慧、活泼、奢侈的詹妮生有两个儿子：丘吉尔和他的弟弟约翰（John），约翰也是一表人才，他性格温和，很讨人喜欢。这个常被叫做杰克的弟弟生于1880年，小丘吉尔6岁。詹妮死于1921年，在她和伦道夫艰难漫长的婚姻还未冷却时，风流成性的詹妮就不断另寻新欢、朝三暮四，自丈夫生病后直到她自己离开人世，詹妮都一直过着这样的生活。伦道夫在感觉自己无力应对各种事务前，就已经因投资南非的兰特（Rand）金矿赚得盆满钵满，只可惜大笔的钱财在他去世后都用来偿还债务了。死后他为詹妮留下了每年2,700英镑的收入和两个要抚养成人的儿子。詹妮本人在丈夫死后也不断遇到经济困难，她的轻浮风流也不再被视为捕风捉影的怀疑，而是被上流社会看做确有其事，后来她又两次再婚（丈夫都比她年轻）。

詹妮对儿子丘吉尔疼爱有加，尤其是在丈夫离世以后，19世纪90年代丘吉尔开始闯荡世界，这时母亲更是为儿子的生活牵肠挂肚。丘吉尔对母亲无疑也是情深义重，但儿时他却没有享受到温暖的母爱。像许多贵族家庭的孩子一样，父母都无暇顾及孩子，他们往往由多位女性亲戚带大。在丘吉尔被早早送往学校前，一直都由布伦海姆宫的奶奶（“他是一个聪明，一点都

不调皮的孩子，做事很有自己的立场”)^①和伯恩茅斯(Bournemouth)的姑姑威姆伯尼夫人(Lady Wimborne)照看，从丘吉尔写给父母的书信中可以看到，他当时非常渴望得到他们更多的关注和爱护，可惜没能如愿。在小丘吉尔的心目中，保姆爱维莉丝特太太(Mrs. Everest)给予了他更多的母爱，在这位慈祥的女性身上，他得到了悉心的教养和温情的照料，丘吉尔的表弟克莱尔(Clare)——詹妮妹妹的孩子，与丘吉尔一起度过了很多快乐的童年时光，丘吉尔对爱维莉丝特的依恋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克莱尔感到惊奇的是，小时候丘吉尔能把上千个铅铸玩具士兵组织起来搏斗、拼杀、演习，游戏中他表现出的兴趣和调兵遣将的能力完全不像是在玩一个童年游戏)。^②离开家后，他常和保姆保持着书信往来(她的信中往往充满了琐碎的消息及对丘吉尔的无限惦念，比如1891年1月21日的信是这样开头的：“我心爱的温尼小宝贝”，信的最后写道“非常非常爱你，很多很多吻——疼你的爱姆”)。^③当爱维莉丝特要离开家，由一些严厉的女教师或女管家接管他时，丘吉尔就会格外想念他的保姆。爱维莉丝特最后还是以管家的身份留在了格罗夫纳公馆(Grosvenor Square)，丘吉尔的母亲一度与七世公爵的遗孀在此居住。当父母因家庭经济紧张打算辞退老保姆时，丘吉尔坚决抗议(虽然并未成功)，他从未与爱姆失去联系，得知她患了不治之症时，他不仅为她争取到了良好的医疗条件并在第二天从安德少特(Aldershot)匆忙赶回伦敦北部，陪在她身边，不久，爱维莉丝特离开人世，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相见。在丘吉尔的《我的早年生活》(*My Early Life*)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感人的文字：

她走得很平静，一生中她默默为别人奉献着，她是那么慈祥，她相信自己对任何事情都无所畏惧，20年来她是我最深爱、最亲密的朋友……^④

① Gilbert, *Churchill: A Life* (1991), p.16.

② Clare Sheridan, *Nuda Veritas* (1927), p.14.

③ Martin Gilbert, *Winston S. Churchill*, i, pt 1, p.221.

④ *My Early Life*, ch. 5.

爱维莉丝特虽然走了，但她永远活在“温尼”的心中。

在学校丘吉尔表现并不出色，不仅如此学校生活还给他带来了许多烦恼和恐惧，三个寄宿学校在他所受的学校教育中各起到了一定作用。8岁那年，收拾好行李，丘吉尔被送到了坐落在艾斯科特的圣·乔治学校（St. George），圣·乔治是一位当过律师的年轻牧师于1877年创办的，1904年它更名为圣·乔治女子学校，尽管该校已多次扩建，现在仍依稀可见丘吉尔就读时的学校原貌。当时任校长的是赫伯特·威廉·施耐德·基纳斯里（Herbert William Sneyd-Kynnersley），圣·乔治是专门为伊顿公学（Eton）和其他一些公立学校输送学童的地方，在这里孩子们被强制背诵经典，不守纪律的孩子往往被施以鞭刑，打得屁股流血，这种体罚让丘吉尔忍无可忍。除了恐怖的校长，学校生活的很多方面都让他备感煎熬。和其他7岁的孩子相比，丘吉尔显得既瘦小又羸弱，他非常希望自己能长得再高大一些，在学校他常常生病，后来也是如此。因为说话结巴而且有些口齿不清（进入政界后他努力改掉了结巴的习惯），在圣·乔治，丘吉尔自然成了其他孩子欺侮的对象，人们常错误地认为那些讲话强硬、长相较凶的人往往身体强健，从某种程度讲丘吉尔是个例外，他喜欢华贵的生活，喜欢被宠爱。当不得不强硬一些的时候他也一定会做到像铁人一样[如1899年逃离比勒陀尼亚（Pretoria），1916年为期数周地蹲在肮脏阴湿的战壕里躲避德国人的枪炮，1942—1944年间在寒冷的飞机上来回飞往几个国家]，但这些事情都需要强大的意志力而非体力。儿童时代的坚定意志往往使他身陷困境而不是远离困境。在圣·乔治丘吉尔度过了一段非常不开心的时光，因为在学校时常挨打，父母开始关心起这个孩子。对儿子身体状况和心情压抑的担忧最终使夫妻俩在家庭医生的推荐下将他转到了汤姆逊姐妹俩（Misses Thomson）创办的布莱顿（Brighton）学校，这所学校坐落在布莱顿的布朗斯威克街（Brunswick Road），它虽不如圣·乔治有名，但课程设置较为自由，1888年丘吉尔自此转入哈罗公学（Harrow），1892年12月离校。

《我的早年生活》一书中有关学校的章节读来让人感到丘吉尔当时很不